

导 论

历史的、现实的词汇 如今正频频集中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从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提出的“民为重 君为轻”到唐太宗李世民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留下的“农村税赋定律”再到当代湖北省的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太厚重的历史积存，太沉重的社会思索，太殷切的现实期盼。世纪之交，当全体国民刚刚迈进梦寐以求的小康门槛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不仅再次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成了国内许多研究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政策的推行而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民工潮”近年来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热点。学者们纷纷聚集于农民流动问题

的研究,各种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但是,已有的成果主要是从“民工潮”对流入地的影响和作用或者“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视角出发的,作为个案的研究也大都选择沿海地区的农村。而在作为“民工潮”输出地的中西部地区,其影响和作用如何,特别是作为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的中西部地区,“民工潮”给农业生产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却关注不够、重视不足。本课题正是从这一方面的问题切入,通过对中部地区的一个省份——江西省 20 个村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来对 21 世纪中国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状况作初步的研究和预测。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主题与意义

研究现状。中国农民流动问题自卢建业在《南洋研究》(上海)1928年第5期发表“国际移民问题与中国”一文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兴起了第一次研究热,如谭其骧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相继发表了《湖南人由来考》和《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胡传楷发表了《安徽宣城的广东村和洪杨乱后的宣城人口》,陈清晨于1940年发表了《人口西迁与中国前途》等等。其后于1957年步入“大萧条”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一项研究热点;至20世纪90年代初,农民流动问题研究达到高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87—2000年的13年间,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农民流动问题的有价值的研究文章达258篇。此外,还有10部研究农民流动的主要专著(作者分别为陈俊生、陈吉元和庾德昌、袁亚愚、韩俊、杜鹰、赵树凯、辜胜阻、黄平、蔡昉、周沛)以及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和多卷本《中国移民史》,石方的《中国人口迁徙史稿》,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史》等等。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

1. 1994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由中国农业部农经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劳动就业部就业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社

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人口所、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八单位组成的课题组，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深入研究取得的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包括杜鹰等著的《走出乡村》、黄平等著的《寻求生存》、赵树凯著的《纵横城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劳动部的《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等。

2. 1995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科院对珠江三角洲外来民工状况和北京大学对东莞民工状况进行的调查研究以及北京大学、北京零点公司、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强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研究员等组织和个人多年来对北京外来民工的跟踪调查和研究。

3. 1994—1995年袁亚愚、吴鹏森、杨青、张文等人对四川、安徽等农村劳动力过剩大省农民流动状况进行的调查研究。

4. 我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以及宋林飞、顾焕章、叶南客、李芸等人对苏南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就地转移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

5. 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省对外来出务工青年的专题调查研究，及其1999年度依据对全国23省（市）45个县（市）4316名农村青年的抽样调查所进行的相关研究。

6. 近年来陆子修与史贤华、李玉江与程道平、梁世夫与王爱莲、刘宇与周叔莲、郭克莎、唐晓腾等等分别对安徽、山东、湖南、四川、江西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流动状况的调查研究。此外翟学伟、宋林娜、杨学成、朱明芬、李南田、田凯等学者则通过解剖一些乡、村或企业个案，来研究农民流动问题。

众多的研究文献，在对农民流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农民流动的作用力、过程、状况、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国内关于当代农民流动的研究还处于启动阶段，研究的时间还不长，对日趋活跃的农民流动问题特别是其成因、动机、影响的全面了解和把握还没达到应有的程度，有深度的成果并不多。而且，在这一研究领域

中，与社会学和人口学界的投入热情相比，应用经济学界的关注则显得明显不足。

对当代农民流动问题的研究尚且如此，那么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更为不足了。由于较多地受某些理论模型的影响，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在国内学术界虽有所涉及，但多是静态对其进行“利弊”判断，而对两者之间的系统反馈或循环机制以及政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离散”作用却缺乏全面的特别是微观的考察。在 1984 年颁发《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国家颁布《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的规定》之初，强调农民流动的“消极面”和“弊端”，特别是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曾是一些同志主张对农民流动实行“堵截”和“限制”的一种普遍心态（至今这仍是相当部分同志的担忧所在）。当然，这些年来研究表明，这种担心并不是全无道理。如秦晖 1995 年组织清华大学学生对浙、湘、黔、川、陕、桂 6 省（区）8 县（市）的 19 个村庄进行的考察结果表明，农民流动后，农业劳动的效益、报酬率确实是提高了，但农业生产的产量与效益却是趋于下降的。赵树凯 1999 年根据在北京的火车站对 818 名外出就业民工开展的问卷调查，从农民流动的动机（谋生还是求富）着眼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当前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间呈现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唐晓腾组织的对江西 12 县（市）6 个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流动带来了劳力外流地区农村的衰落，农业生产效益与耕地利用率也大大下降。但是，也有一些调查表明，农民流动推动和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王西玉组织开展的对 9 省 13 县市的调查结果，认为农民流动催化了乡村发展。这些争论和事实说明，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究竟如何，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扎实地进行研究才能作出回答的课题。

加入 WTO 后，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同样值得研究的还有一系列问题，如（1）当前农民流动究竟有什么新变化、新特征？（2）农民流动的规模到底怎样？其变化趋势如何？造成这种变化的成因到底是什么？（3）农民流动对农业生

究究竟有多大影响？（4）如果有影响，那么，在影响农业生产的诸因素中，农民流动因素实际上处于什么位置？（5）如果有影响，那农民流动又是如何对其发生影响的？（6）如果有影响，又该怎样来评价这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又将怎样？如何看待和怎么对待农民流动问题？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中还少有人对这些基本而又现实的问题进行过客观而又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西方经济学界，对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先后取得并发表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 [美] 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的《乡村变迁》，[法] H. 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美] 马尔科姆·吉利斯等的《发展经济学》[美] 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经济增长理论》[美]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的《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对策》[美] 西奥多·W·舒尔茨的《经济增长与农业》《改造传统农业》[印度] 苏·加塔克等的《农业与经济发展》，[美] 罗伯特·M·索洛等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美]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英] A. P. 瑟尔瓦尔的《增长与发展》等等，并形成了研究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问题的两大理论模型：刘易斯模型（以及类似的费—拉尼斯模型）与舒尔茨模型，和研究农民流动原因与农民价值理念的两种相互对立和争辩的理论论题：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管是刘易斯，还是舒尔茨，也不管是波普金，还是斯科特，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来自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考察研究，他们的观点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都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都不是直接针对中国社会的，这就对解答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还缺乏现实指导意义。

显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不能苛求于国外的学者。国外汉学家虽然一直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但限于种种条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20 世纪上半叶及其前的农民流动情况，依据的多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南满 惯行调查”资料或 20 世纪

5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教会对华南等地的考察素材,如1919—1920年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D.H. 库尔普指导学生对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而写的《华南乡村生活》,1921—1925年间金陵大学教授J.L. 卜凯对中国7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5年的调查而作的《中国农家经济》,华洋义赈会总会C.B. Malone和J.B. Taylor两教授于1922年组织的对冀、鲁、苏、皖、浙等省240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调查写出的《中国农村经济》。此外,还有中国学者的成果,如陈翰笙博士于1928—1934年间组织数十位研究者对无锡、保定和广东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调查的有关资料,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只有为数极少的国外学者(如黄宗智、David F. Sly、葛迪斯、塞缪尔·何保山等)曾深入我国农村,对农民流动近况作过贴近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农民流动问题有些独到的研究,如David F. Sly对农民流动中信息的传递和带动流动扩张的主要桥梁是缘于血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的看法,塞缪尔·何保山对江苏农村非农化发展的研究等等。另外,就是美国著名学者何炳棣、日本学者夏井春喜考察和论述了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地区人口的变化和战后移民问题。但是,国外汉学家对中国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却不愿发表多少意见。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西方经济学者那里(如马若孟、Claude Aubert、D. Gale Johnson、Calin A. Carter等)他们也无法据实对当前中国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互动关系问题发表看法。

研究主题和学术价值。在中国,经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学,固然离不开对国外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借鉴和运用,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把握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对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及根本性问题进行自己的理论综合和理论创造,建立一套最适合中国实际的学科语言和理论体系。事实上,在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大汇聚、大碰撞、大综合的中国,这样的根本性论题大量涌现,使经济学建设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极好机遇。毫无疑问,我国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道纯经验性研究论题,而正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实证性研究论题。它不只是技术性地讨论和解释性地理解有关规范农民流动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它实质上还是一个农村社会怎样组织、管理和构造的问题,是一个怎么处理国家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分歧及进行制度性整合的问题,是一个如何处理农村现代化与农村社会传统、政府政策取向与民众行为选择的关系的问题。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本课题,确实是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学。

研究目的和意义。对当前我国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对农民流动问题,至今人们的争论仍然较大。如对农民流动现象,有人持“乐观”态度,主张“放”、“引导”;有人持“悲观”态度,主张“收”、“堵截”;还有一种持“中间”态度,主张顺其自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农民流动问题虽然一直保持着客观的态度,先后制定、下发了一些加强外出民工管理和规范农民有序流动的有关文件和通知,但并未把农民流动放在公民权益与全要素市场配置的背景下来考虑,因而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相关改革也是滞后的。与此同时,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没有得到加强。这样,预期利益的驱动与“制度性的厌农、弃农”相交合,形成了现时代背景下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因此,研究本课题有着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1)有助于澄清人们在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一些不恰当认识和观点,为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基础。(2)有助于修正和完善有关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实践。

第二节 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村委会及其所属村落是中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因此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来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不仅

是人类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①

本课题研究的 20 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 20 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分析这 20 个村的基本概况,就可发现它们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从区域分布看,处于江西东部的有朝阳村、芳山村,位居江西西部的有杨村、栗水村、东洛村、高汪村,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有柳田村、泉溪村、新基村,处江西南部的有东林村、马岭村、肖田村,处江西中部的有滁山村、坊城村、旧下村、康山村,还有处于江西西南部的古竹村、泉塘村、沙田村,位于江西东南部的吴村。从行政区划看(见表 0-1)这些村分别隶属于 17 个县 9 个地级市(南昌市 2 个)九江市(3 个)赣州市(1 个)吉安市(6 个)上饶市(2 个)宜春市(3 个)、萍乡市(1 个)新余市(1 个)抚州市(1 个),占江西省 11 个地级市的 82%。从区位看,位于城镇郊区的有杨村、芳山村、康山村,其他村与城镇都有一定的距离,大约在 15~25 公里之间,泉溪村、高汪村、东林村和马岭村还属于偏僻的山区村落。就交通而言,交通方便的村占 45%,交通较为方便的村占 25%,交通不方便的村占 30%。地处平原的村有 6 个,丘陵地带的有 8 个,山区的有 5 个,水乡的有 2 个。从行政村的规模看,人口在 2000 人以上的有 6 个(即杨村、滁山村、康山村、吴村、沙田村、东洛村),人口在 1000~2000 人的有芳山、古竹、朝阳、柳田、旧下、栗水、东林、马岭、泉塘等 9 村,人口在 1000 人以下的有坊城村、泉溪村、高汪村、肖田村、新

关于以村落为中国农村研究单位的方法论讨论,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曾作了详细的评论,可参见该书的第一章。李国庆(2000)和肖唐镖(2001)对此也有相关引介。

基村。

表 0-1

行政区域分布图

市 名	县名及村名
上饶市	上饶县芳山村、玉山县朝阳村
南昌市	进贤县旧下村、南昌县康山村
九江市	九江县柳田村、武宁县泉溪村、永修县新基村
宜春市	樟树市滁山村、丰城市坊城村、袁州区杨村
吉安市	泰和县马岭村,万安县肖田村,永新县古竹村、沙田村、泉塘村、高汪村
萍乡市	湘中区栗水村
新余市	渝水区东洛村
抚州市	崇仁县吴村
赣州市	兴国县东林村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么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 0-2）来看，以稻作物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 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有 2 个村，占 10%；在 1500~2000 元之间的有 7 个，占 35%；1000~1500 元的有 6 个，占 30%；在 1000 元以下的为 5 个，占 25%。其中有 1 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 500 元以下。同年，有 60% 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在 5 万元以下的村占 35%。在 5~20 万元的村有 15%，30 万元以上的村占 10%。而且大多数村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有 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特点。

表 0-2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

N=20(村)

以稻作物 农业为主	以经济作 物为主	以林牧 养殖为主	个体私营 经济状况
80%	10%	10%	发达村 5%，一般村 15%， 不发达村 80%

资料来源 对 20 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全书结构

一、研究方法 with 资料来源

本书所关注的农民流动，是农民为谋求充裕的生存资源和优越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流动，是谋生手段优化和生存空间选择的流动，是农村社会转型和农村经济转轨中的各种要素再配置的过程。具体地说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生活空间的流动；二是指就业领域的流动。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研究作为一项综合研究，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就本课题研究而言，主要是通过个案调查。研究者依凭与调查村的某种密切关系或联系进入实地，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为主要手段，全面了解各村的农民流动状况和农业生产、乡村社会治理及农民的生活、观念变化状况，并努力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同时还在上海、广州、南昌、苏州等城市选取 20 名外来务工人员作为访谈对象进行个人访谈。课题组成员以调查者的亲身体验和以上调查所得的资料为基础，按全景描述法对调查村和访谈者的情况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立体的白描式的叙述和分析。

1. 实证研究方法。(1) 采取点面结合的调查方式。既进行全面性调查，把握宏观的全局性情况；又进行典型调查，选择若干村庄和流动/转移的农户、农民进行个案解剖。课题组成员按照统一设计的主题和访谈提纲多次进入调查村进行田野调查。(2) 采取多种方法并用的调查方式。既进行文献材料和统计资料分析，也通过实地考察、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等方式开展实地调查(地域调查、类型调查和重点调查)还进行问卷调查按统一设计的问卷对村干部、村民和乡镇干部进行结构性访谈，在 20 个村共完成对 500 户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而且还有对 84 名乡村干部和 20 个外来务工人员的非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2. 区域史研究法。即通过对地方志、地名志和有关的地方

性历史史料以及省、市(地区)、县等三级政府的统计资料对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状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地方志是记载区域自然、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物、地理等各方面。区域史研究由于受研究范围的限制,正史记载明显不足,而地方志则可以弥补缺陷。正如谭其骧(1994)所提出的,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3. 交叉研究方法。将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人口学、农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对农业生产与农民流动关系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进行理论提升。

同时,我们在个案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结合问卷统计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经验性典型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综合性类型研究,以尝试提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结果。

二、拟研究的主要问题

1. 我国农民流动/转移的基本状况、成因和特征分析。

- (1)农民流动/转移的兴起和发展过程。
- (2)农民流动/转移的规模和广度(普遍性分析)。
- (3)农民流动/转移的地域性、区位性分析。
- (4)影响农民流动/转移的因素及其变迁过程分析。
- (5)农民流动/转移的结构特点及其变化过程。

2. 农业生产中的农民流动/转移因素分析。

- (1)不同类型农民流动/转移村的农业生产状况。

区别以少数农民流动、多数农民流动、绝大多数农民流动以及就地转移为主、异地转移为主和就地异地转移并存的村为对象,对其农业生产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看农民流动/转移在其中的影响。

- (2)不同发展程度村中的农民流动/转移状况和结构分析。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类型不同的村为代表,比较研究在它们的农业生产中农民流动/转移因素的作用状况。

(3) 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类因素比较, 分析其基本因素、主要因素, 研究农民流动 / 转移因素在其中所占的位置。

(4) 本题讨论和小结: 农民流动在我国会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必然条件吗?

3. 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流动的影响分析。

(1) 纵向比较: 从若干个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村的前后变化过程, 看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对农民流动 / 转移的影响。

(2) 横向比较 对若干个经济、社会和历史传统类型相近 (但近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程度不同, 农民流动 / 转移的方式、规模也不同) 的村作比较分析, 看农业生产发展程度对农民流动的影响。

(3) 本题讨论和小结: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否能成为农民有序流动的一条制度性途径?

4. 农民的利益取向和价值选择 (有关心态) 研究。

(1) 在农业生产中农民的行为和心态表现。

(2) 在流动过程中农民的行为和心态表现。

(3) 农民是怎样看待农业生产和自身流动的?

(4) 当地的乡村干部是怎样看待农业生产和农民流动的?

(5) 本题讨论和小结: 在乡村干部和农民观念中, 农业生产与农民流动之间能否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有序格局?

5. 政策回溯与分析。

(1) 农民流动 / 转移的发展趋势研究。

(2) 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研究。

(3) 农业的基础地位与稳定作用研究。

(4) 政府的农民流动 / 转移政策的回顾与评价。

(5) 政府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回顾与评价。

(6) 正确对待农民流动 / 转移, 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建议。

6. 总结性讨论: 一个理论思考。

(1) 从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问题, 看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传统的关系。

(2) 从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问题，看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政府政策取向与民众行为选择的关系以及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农业生产态势的走向。

三、预期效益

如何准确把握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的互动关系，即：(1)农业生产中的农民流动/转移因素分析；(2)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流动/转移的影响分析。并依据本课题研究，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传统、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政府政策取向与民众行为选择等实质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本课题正是秉承这一主旨，通过对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省份——江西省的 20 个行政村的实证调查和综合分析，来对 21 世纪中国农民流动与农业、农村社会发展的关系状况作初步的研究和预测。本课题研究的完成，必将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它能为正确认识、处理我国农民流动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从而不仅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农民非农化提供直接服务，而且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直接服务，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

第一章

近代农民流动状况、 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明清以降 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 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 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内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 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 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第一节 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中国农村是一个乡土社会，其特征有两点：一是从人与空间的关系看 中国农村社会的人口是不流动的；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中国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对外以聚居集团为单位的孤立和隔膜而对内则是人皆共享的“熟悉”（费孝通，1947）因此，“安土重迁”、“珍视泥土”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

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因为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 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本已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

太平天国时期，江西是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到咸丰六年六月，江西十三府有九府掌握在太平军手中，成为一片比较巩固的天国统治区”^①。而作为晚清王朝清剿太平军的主力湘军，就是产生于与江西接壤的湖南。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调查的 20 个样本村都处于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区域内。太平军与清军的湘军在江西激战数年（自咸丰三年至咸丰十一年），当时的湘军头领曾国藩的指挥所设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就长达 3 年多时间。长年的战乱，不仅给江西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的乡绅缙士经常被强制性要求捐助，湘军还先后在南康、星子、瑞昌、德安、建昌、武宁、靖安、奉新、安义、丰城、瑞州、上高、新昌等县设立厘卡抽税 因此 当时的江西人民既要承担地方官员正常收取的税收，还得交纳湘军的厘金。于是设卡之处，无不民怨沸腾，百姓苦不堪言。^②战争的创伤、沉重的税赋，使得耕地荒芜、百业凋敝，不少商贾和富户纷纷迁居异地，而贫苦老百姓则更是携家带口流落他乡。

20 世纪初，积贫积弱的满清帝国像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

^②见《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资料史丛刊 神州国光社 1952 年 7 月初版。

割据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翁迁避，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了剪径打劫和绑票的土匪勾当。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①。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南昌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同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起义遭到重挫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一万多人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从此，在井冈山这片土地上，燃起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也是在江西这片土地上，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行了长达7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革命战争。同时，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1931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建立，江西进入了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苏维埃革命中，为了逃避革命斗争的打击，首先出现的是闽赣边区富裕阶层大批外徙。随着战争加剧与长期化，厌战的人民也逐步加入了外出避难和另谋生路的行列。东林村当时就有5户近30人外出避战，其所在的兴国县，1930年“难民逃赣，赣州者达7万人”^②。而在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泉塘村、沙田村和高汪村，也都有不少村民逃往吉安；当时逃入吉安的人数达19万多人（赣州也相差不多）^③，而国民政府军的“围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1页。

② 《江西民国日报》，1930年7月15日。

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61页。

剿’和 6 年多反复拉锯式的国共战争给当时苏区社会与劳动力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1928—1934 年国共内战期间仅江西苏区就死亡 567869 人，其中红军死亡 270000 人（何炳棣，1989）。至于江西全省的死亡人数和流亡人数，因囿于资料 and 我们的精力有限，要准确地统计分析出具体的数字有相当的难度。

与此相对应的是，因为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影响的广泛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中。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 50 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古竹村唐氏青年人数的 55.4%。还有 20 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① 东林村也有 20 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 年 10 月毛泽东对兴国 8 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 户人家有 16~48 岁的青壮年 31 人，其中共有 14 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 45%；^② 在 1928—1934 年间兴国县共有 80000 人参加了红军。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动力参军参战的程度。

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 7 个样本村 1934 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动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泉塘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党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的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

唐晓腾（2002）：《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49—1999》。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84—199 页。

③ 《兴国县志》，1988 年，第 5 页。